

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誉的缺失和塑造

范 炜, 管 辉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银行信誉的概念,并从银行危机角度阐明银行信誉的重要性,然后着重分析说明国有银行信誉的缺失和国家信誉的日益强化可能导致扭曲的、具有自我固化特征的风险传导路径,最后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分析指出目前国家信誉的逐步淡出和塑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誉迫在眉睫,并提出塑造国有商业银行信誉的一个具体构想。

关键词:国有银行信誉;国家信誉;银行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6-0016-03

一、银行信誉的定义和银行信誉的重要性

所谓信誉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赢得他人信任的能力。由于本文从存款人与银行关系的角度来研究银行信誉,所以把银行信誉定义为相对于存款人来说拥有信息优势的银行赢得存款人信任,使存款人放心地将存款放入银行而不发生挤兑的能力。

银行相对于非银行企业来说更容易建立信誉。银行的本质在于把非银行企业贷款行为的单期博弈转换为银行贷款行为的重复博弈,银行把个别企业零星的贷款业务变成持续的、长期的贷款业务,就获得了与存款人的长期博弈。因为存款者与银行之间的这种长期的交易关系,使存款人认为银行会为了长期利益而放弃就短期来说过分冒险的项目,银行因此可以获得信誉。银行提供的这种信誉是银行代替无法提供这种信誉的非银行企业提供给存款人的,正是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的重复借款行为产生的重复博弈使得银行相对于非银行企业来

说更有信誉,因为后者与存款人之间发生的借款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期博弈。^[1]

良好的银行信誉能使存款人的存款顺利地流入生产领域,为实体经济服务,进而增加居民的收入,使存款人将更大比例的收入存入银行,支持更大范围的生产,从而带来经济的良性发展。然而近年来,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由于银行缺少信誉,居民往往手持货币而不是将其存入银行。如受到债务危机困扰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银行信誉几乎被耗尽,从而带来了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的发生会给经济金融秩序带来结构性的破坏,甚至会引发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危机。Bernake(1983)认为正是大量的银行倒闭带来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危机时持久的严重后果。Leland和Pyle(1977)以及Fama(1985)认为,银行中介的职能对某些类型的借款者来说是不可少的,银行长期收集借款者的有关信息,从而能对不同类型的借款作出识别,而银行倒闭就会导致这些信息的丧失。当经济需要重新获取这些信息时就不得不支付另外的成本。Hoggarth等人(2002)对银行危机的成本进行了估算和研究,研究表明,银行危机爆发后重组金融部门的成本相当高昂,有的国家甚至占到了GDP的55%以上。^[2]

收稿日期:2006-02-03

作者简介:范 炜(1981-),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硕士研究生;

管 辉(1975-),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硕士研究生。

Minsky(1986)和 Kindleberger(1995)分别从实体经济周期变化的角度来解释银行危机的发生,他们的分析表明,尽管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银行危机的最终爆发往往是由于公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产生对银行的挤提的结果。弗里德曼就认为由公众信心动摇所导致的挤兑是爆发危机的原因。对存款者的恐慌与银行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经典的现代表述的是 Diamond 和 Dybvig(1983),他们研究了纯粹因为存款者信心丧失所导致的银行挤提,他们研究的存款者的信心危机是基于非理性的基础上的,而 Gorton(1985),Chari 和 Jagannathan(1988)发展了在理性基础上产生的信心危机与银行危机。另外,银行信誉的缺失还会引起银行失败的传染性。Park(1992)认为,银行挤提之所以具有传染性,是因为银行信誉的缺失使得存款人对不同类别的银行难以区分,这样,那些资产质量好的银行就会受到牵连,从而也受到银行挤提的困扰。由此可见,建立良好的银行信誉是十分重要的。^[3]

二、在强大的国家信誉下银行信誉的缺失

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国有银行的规模十分庞大,而且国有银行在运营机制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一家银行信誉受损往往波及其余几家,因此,保持国有银行的良好信誉十分重要。

在有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公众对国有银行的信任度比较高,然而与公众较高的信任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有银行运营效率往往比较差,偿还负债的能力比较弱,资本充足率偏低,资产质量低下,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国有银行其最终的所有权是国家的,在某种程度上国有银行是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而行事。国家的目标往往是多元的,它并非只关注盈利这个唯一目标。如国家常常会要求国有银行为扶持某个项目而发放贷款,尽管该项目从盈利的角度来讲也许并不是最优的,这样国有银行就有动机在自身经营效益不好时将责任推到国家身上。国有银行本身是在非竞争性市场上与非国有银行展开竞争的,尽管从自身效益来讲国有银行并不如后者,公众也明白国有银行相对于非国有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具有更多的“逆向选择”特性,但是他们为何不将存款更多的存入运营效率更高的非国有银行

呢?这并非是公众缺少理性,他们看到的是国有银行信誉缺失背后强大的国家信誉,因为很少会出现国有银行破产的事件。公众也知道他们的存款会在国有银行遇到“道德风险”,因为后者会在不动用或动用很少其自有资本的情况下拿存款人的存款去放贷给具有高盈利同时具有高风险的项目。这样盈利时其自身能获得好处,而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又可以将责任或多或少的往国家身上推。然而这些高风险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相对而言,更具发展潜力的民营部门的高风险项目更值得投资,但同样有失败的风险,而如果这些项目失败了国家往往并不买单,国家还常常可以有充分的理由问责国有银行,因此,出于稳妥的动机,国有银行会将贷款投向那些在项目失败时难以分清是他们自身责任的项目上,而这些项目经常是一些成功可能性较小的项目。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有银行认可的具有高回报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项目,而这些项目失败概率很大。这样相对于对民营部门贷款而言,国有银行选择的这部分国有企业项目也更具有“逆向选择”的特性。^[4]同时,为这些高风险项目借款的国有部门也会有强烈的“道德风险”动机。国有银行这样做同样是看到了国家信誉能够代替缺失的国有银行自身信誉,而不会引起存款人怀疑其存款的安全性。这样在自身信誉缺失的情况下,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放贷行为却是国有银行基于自身理性在国家信誉庇护下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那些为高风险项目而借款的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在于:他们认为自己 and 国有银行一样同属国有企业,即使项目失败了也和国有银行一样由国家来承担损失。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风险传导路径,即存款人基于自己的理性把更多的存款给相对于非国有银行更有激励形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基于自身的理性去选择那些更具“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特性的项目,在强大的国家信誉庇护下,这条风险传导路径具有自我固化的倾向。因为公众观察到的国家信誉有一个从“隐性”走向“显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使上述风险传导路径得以固化。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一国国有银行信誉缺失情况下,凭借国家信誉的支撑,存款人基于自身的理性更多地选择去国有银行存款,进而通过后者的行动产生扭曲的风险传导路径,而且随着公众预期的国家信誉的强化,该风险传导路径还有自我固化的趋势。

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现实状况及建立良好信誉的构想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进行了8次较大幅度的降息,然而我国居民的储蓄热情不减,储蓄额反而不断攀升。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996年为38520亿元,到2005年底已经上升到141051亿元。^[5]而在居民的储蓄存款中,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余额又占了绝大部分,由此可见,我国公众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任程度很高。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都受到政府有关政策的约束、诱导与规制,然而自身的信誉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从而与公众对国有商业银行强烈的信任程度相比就显得有些不足。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虽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是,目前外资银行进入国内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与国有商业银行竞争的步伐日渐迫近,而且一些著名的外资银行如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银行等跨国银行以其稳定的经营、优良的业绩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卓越的信誉,他们必将以自身的信誉吸引我国存款人,与国有商业银行争夺客户。在国家信誉的长期庇护下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潜在的引发银行危机的因素一旦诱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背后的国家信誉逐渐淡出,塑造起自身的信誉已经迫在眉睫。^[6]还必须指出,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誉缺失,国家信誉愈是强化,其逐渐淡出所带来的成本就越大,就好比弯弓一样,拉得越弯,释放后其反弹的力道也越大。因此需要慎重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以便以较小的代价淡出国家信誉。

本文在此提出,一个塑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誉的构想:银行信誉的塑造其实就是设计一个让银行向公众传递自身信誉的方法。具体而言,可以成立一个类似联盟机构的“国有商业银行共同体”,让国有商业银行自愿加入该共同体,组成其会员银行。该共同体必须设计出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如资本充足率要求、运营效率的指标要求等,必须有严格的监督机制,能够防止成员银行弄虚作假,逃避监督,隐瞒风险等,必要时可以让严重不合规的银行退出共同体,同时还要让会员银行在收益和风险上形成联动机制。这样,如果该共同体的各项惩罚机制、监督机制等设计得十分有效,国有商业银行就会希望加入国有商业银行共同体成为会员银行,因为他们

认为,与没有加入的非会员银行相比,加入该共同体本身就向公众发出了自身信誉优良的信号,当然前提是公众必须认同这个国有商业银行共同体。成员银行会考虑到如果由于自身原因被共同体清退,就会向存款人传递信誉低下的信号,从而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考虑到这一点,它就会合规运营。同时各家会员银行之间的风险收益联动机制,使一家会员银行对其他会员银行有较强的监督动机,因为一家银行信誉受损将会影响到其它会员银行的信誉,从而限制了会员银行的太大的风险倾向。

一旦某一家会员银行出现了类似银行危机的迹象而可能引发公众的挤兑时,该共同体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发行一种特别凭证,证明存款人的债权,同时限制所有会员银行接受其存款人的提款要求,而让其存款客户持特别凭证直接向共同体提款。共同体不必向公众公布哪家会员银行出现了危机迹象,而是在共同体内部联合所有的会员银行的力量来化解危机,等到危机消退后再恢复各成员银行的正常运作。由于公众对该共同体的信任,同时他们的兑付要求也能得到正常的满足,在存款人对国有商业银行共同体的信誉认同感很强并且共同体也不具体公布哪家会员银行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就不太可能引发全面的挤兑,不至于造成系统性的银行危机。■

参考文献:

- [1] Fama,E..What different about bank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15:29-40.
- [2] Bernake,B..Non 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ed crisis in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73:257-276.
- [3] Leland,H.E., Pyle,D.H.Information asymmetry,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7,32:371-387.
- [4] Chari,v.v.,Jagannathan,R.. Banking panics, information, a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equilibrium[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88,43:749-763
- [5] 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 [6] 周好文.“国家信誉”应从国有银行淡出[J].当代经济科学研究,2003,(1).